心理学报 2021, Vol. 53, No. 9, 944−959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1.00944

语言演变差异与族群/方言名称对族群信息加工的影响——以广东三大汉语方言为例*

伍丽梅[1] 张积家[2,1] 孟 乐[3] 张小林[1] 黄楠芯[1] 张金桥[1]

([1]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广州 510610) ([2]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桂林 541004)
([3]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语言是族群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基于广东三大方言族群均为中原移民的史实, 探讨三大汉语方言的语言演变差异与族群/方言名称对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信息加工的影响。以方言为客家话、粤语和潮汕话的广东大学生为被试, 实验 1 采用群体参照的 R/K 范式, 考察不同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信息的记忆; 实验 2 采用启动 Stroop 范式, 考察不同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信息的注意偏向。结果表明, 语言演变差异与族群/方言名称影响不同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的信息保持, 顽强地保持祖先语言的客家方言族群对中原族群的信息加工产生群体参照效应; 语言演变差异和族群/方言名称影响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信息的注意偏向, 客家方言族群对中原族群的信息加工产生注意偏向。整个研究表明, 语言演变差异和族群/方言名称影响对同祖语族群的信息加工, 完整地保留汉祖语特点、强化方言与汉祖语的关系, 能够增强根祖意识, 增进对同根族群的认同。研究结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语言演变, 族群名称, 方言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族群(Ethnic group)最初用于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 或者由小规模群体向更大的社会迈进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周大鸣, 2001)。目前, “族群”的概念被广泛使用。虽然学术界对族群的划分标准还有争论, 但对族群的文化特征基本形成了共识。“族群”不等同于“民族”。民族是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宗教、行为、生物特征而与其他群体有所区别的群体(张积家, 2019)。民族更强调政治性, 族群更强调文化性(徐杰舜, 2002)。人的族群身份界定要比民族身份界定更加自由和灵活。族群可以指民族、民系、部落, 或者依照宗教信仰来归类, 也可以根据出生地、祖籍地、居住地、工作地或语言来归类。“族群边界”理论从族群的归属性和排他性来界定族群, 认为“族群”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 族群成员通过不同行为维持族群的文化特征, 限定“我们”排除“他们”, 这种“排他性”被定义为“边界” (Barth, 2016)。在历史上, 族群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实体, 而是流动着的共同体, 由此凸显了“边界”的意义; “边界”是构建的, 其实质是分类的社会实践, 在族群互动情境中, 体现为个体对“我们”族群的认同。

族群认同的实质是群体的自我认同。根据社会身份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 社会认同来自社会分类和社会比较, 与社会身份获得息息相关。人在社会情境中自动地对人群贴上内、外群体的标签——“我们”和“他们” (社会分类), 并且比较内、外群体的社

收稿日期: 2020-09-13
*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少数民族学生双语学习认知规律研究” (项目编号：2017-GMA-004)、暨南大学大统战专项研究项目“港澳台和海外华侨青年语言教育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12620821)。
注：张积家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张积家, E-mail: zhangjj1955@163.com

会地位、名声等(社会比较), 获得对所属群体的评价; 同时在积极自我评价指导下, 使所属群体在某些维度上优于外群体, 从而获得明确的族群认同(万明钢, 王舟, 2007)。族群身份获得是从被动到主动、从表面到深层的过程, 族群认同也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刘红旭, 2013)。在中华文化中, 族群身份构建往往绕不开根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崇先报本, 慎终追远”的情怀, 表现为对祖源的追寻和报答。由此, 族群认同也是对群体自我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追寻与确认。

族群的生成与发展, 既是共同血缘与文化共同体的延续与发展, 也是在环境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与其他族群融合及分化的结果。族群在演变中自然产生了同根族群。在与同根族群互动时, 人们如何分类? 虽然未有研究直接考察这一问题, 但相关的探讨仍然颇具启发意义。例如, 追寻姓氏(家族血缘标志)、谱系(一家一姓之史)是寻根的捷径, 姓氏既是个体的符号, 也是同根共祖的标签(王泉根, 2012)。达斡尔族人在见面时先询问对方的哈拉(姓氏)、莫昆(家族), 作为是否交谈下去的界定, 这种询问有助于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刘宏宇, 李琰, 2001)。研究发现, 同姓氏陌生人比异姓氏陌生人具有更高的自我相关性, 加工同姓氏陌生人诱发了更大的 P200 波幅(Zhu et al., 2018), 表明代表祖先血统的姓氏引发了与自我有关的加工。又如, 同根共祖意味着曾经生活在共同的地理环境中(葛兆光, 2012), 拥有共同的祖籍地; 对祖籍族群的认同体现为老乡心理(姜永志 等, 2012)。当人身处外地时, 参照本省(市)人加工的成绩显著优于参照其他群体(张鹏英, 张海钟, 2013), 提示老乡身份引发了强烈的“老乡情结”和“老乡认同”。

一般说来, 语言、表现文化、宗教信仰及实践、服饰、节日、宗族与姓氏等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周大鸣, 2002)。语言在族群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构成了族群成员身份的内在标志。研究者对语言的认同功能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李宇明, 2018; Shearer & Sun, 2017; 孙宏开, 2017)。“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 共享同一种文化, 坚守同一种信念。族群身份内化不只是血缘遗传的结果, 更需要接受者在语言勾勒的“文化圈”内认知、评价、接受和强化。语言在构筑“我们群体”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语言具有文化功能, 它不仅是族群文化的载体, 更是族群文化的核心。这是因为: (1)族群语言体现族群的社会面貌, 记录族群的历史, 语言历经传承和变迁, 是族群生活经验的结晶, 也反映本族群与他族群的关系。语言所附带的族群记忆、习俗、价值观, 成为族群认知和整合的重要介质。童谣、故事、传说、俗语, 无一不是族群生活的延续和写照。作为祖辈生活经验积累的成果, 语言代表着过往经验, 又承载着流动的生活面貌, 甚至可以经由语言来展望未来, 维持社会的生长。(2)语言折射族群精神。洪堡特(1999)说: “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 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像。”不同的语言是人类精神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自我显示。语言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人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 “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 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中, 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姚小平, 1995)语言习得是人置身于社会中、逐渐领会语言指代的意义并且学会说话的过程。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语音、语调各有特点, 这些特点关联着语言使用者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个体的成长发育, 伴随着以语言为内核的族群精神气质的长期潜移默化, 使之最终成为熟练使用本族群语言、具备本族群思维习惯、焕发出族群荣辱感的族群人。因此, 语言作为言说载体, 却因为具有边界为族群划定了界域。语言确立了族群边界, 维持并且强化族群意识。语言被视为维护和继承族群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正如洪堡特(1999)所说: “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 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 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 越丰富多彩。语言就其内在联系方面而言, 只不过是民族语言意识的产物……。”由此推论, 从有思想意识到有明确的族群认知, 语言不仅仅是信息交互的媒介。语言遗存了族群发展演变的痕迹, 这些痕迹虽然不一定为讲话者所认知或意识, 但却在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中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人, 构筑了人的文化底蕴, 形成了人的祖根意识。

这种现象在客家方言中表现得最明显。“宁丢祖宗田, 不丢祖宗言”是客家人世代恪守的祖训。客家话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承载了丰厚的客家文化记忆和生活信息, 是凝聚与辨识客家族群的鲜明标志。黄遵宪写道: “筚路挑孤辗转迁, 南来远过一千年; 方言足证中原韵, 礼俗犹存三代前。”(《己亥杂诗·筚路桃弧展转迁》)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 代表着中原发达的汉文化, 以中原汉民

族共同语——河洛雅言作为通行交际语(周文顺，徐宁生，1998)。客家话发端于古汉语，是古汉语保存最完整的语言。客家方言的口音与中原古音同源，是古中原汉语的活化石。客家方言的音韵极接近于唐五代至宋初时中原地区的语言，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祖语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成。客家方言的许多音韵特征与晚唐五代宋音韵的要点相符。音韵学证据与史学家结论以及文献族谱记载大体一致(邓晓华，王士元，2003)。许多中原汉语的古词语，虽然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消亡了，却在客家方言中依然保持着生命力(樊洛平，2016)。因此，客家方言保持了中原古汉语的主体成分。客家人在南迁中不忘自己的语言，提示客家人的“根”在中原(郑秋晨，2016)。“客家”名称在塑造客家人的中原意识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都是南方汉族支系，但客家人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

同是移民语言，与客家话相比，粤语与潮汕话各有特点。粤语的发展更具有个性。粤语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在语音上与中原汉语接近，在词汇和语法上残留着古越语的底层，是与汉语共同语有相对差异性的地域方言。粤语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华夏语言，即雅言。雅言的基础是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到周朝，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粤语与普通话虽然“同源”，但自秦、汉以后，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相同。当粤语形成了既具有特点又大体上同于汉语的方言而且有了一定的流通范围后，便停止了接受北方汉语的进一步同化，甚至对这种同化产生了抗拒作用，从“求同”转向了“求异” (李新魁，1994)。拒绝同化的原因是粤语较多地保存了隋唐前中原汉语的面貌，并且保持了相对稳定性，现在的粤语人也常以此为豪。由于中原地区从“永嘉之乱”起受北方游牧民族统治接近 300 年，汉语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岭南汉人使用的粤语却较多地保留着魏晋年间中原汉语的面貌。即，粤语与中原汉语距离拉开主要是由于中原汉语的变化所致(叶国泉，罗康宁，1995)。时至今日，粤语和普通话不仅早已经脱离了古汉语，少了许多相同之处，更各自增加了许多特色，表现出更明显的差别(李敬忠，2000)。

潮汕话的来源具有多元性，其近祖是福建闽语，其远祖是江浙吴语(李新魁，1987a)。主要包括三方面：(1)古吴越语的遗存，并且吸收了楚方言(楚语)的成分。潮汕话是闽方言的分支，闽方言是从吴语演变而成的，而早在先秦时期，吴语就受楚语影响，即潮汕话的远祖包括吴语及部分楚语；(2)直接与间接地接受中原汉语的影响；(3)土著民族(闽越)语言(古台语)的某些沉积成分(李新魁，1994)。现代潮汕话有差别明显的两种读音：说话音和读书音，前者保存了大量汉代语言的特点和汉代词语或特有的词义，这些是三国前吴越语的遗留；后者较多地保留了六朝及唐代的语言特点及词义。现代的潮汕方言，不仅在词汇上与吴语相同或者相近，在某些特殊用语上也相同或者相近(李新魁，1987b)。

广东位于祖国的南端，是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南向移民的重要归宿。粤、闽、客方言在广东呈三足鼎立之势。最强势的是粤方言，分布在珠三角区域、粤西西江流域、粤北北江流域及粤东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为 6000 万。闽方言集中分布于粤东南与粤西南的沿海区域，分为潮汕片和雷州片两个次方言，前者接近于闽南方言，后者接近于海南方言，中山、清远、韶关、惠州等地还有一些闽方言岛，使用人口约为 1895 万。客家方言主要集中在粤东北与粤北地区，粤西部分地区也有成片的客家话分布，零星的客家话村落散布于全省的多数地区，使用人口约为 2000 万(甘于恩，简倩敏，2010)。

客家话、粤语和潮汕话三大汉语方言，虽然都是由中原汉人南移形成的，但语言来源、演变历史和方言名称存在着差异。从语言本身看，客家话与中原汉语差异最小，粤语次之，潮汕话与中原汉语差异最大；从语言变异时间看，客家话从中原汉语变异最晚，粤语次之，潮汕活最早；从方言名称看，客家话名称中有“客”语素，时刻提醒着讲话者的“根”在中原，粤语和潮汕话则以地域名称之。族群名称也存在着差异，广府人、潮汕人以居住地名称之，客家人的名称却宣示着“外来者”的身份。笔者预期，三个方言族群对中原汉族族群的认知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既与语言间差异的大小、变异的时间长短有关，也与族群/方言的名称有关。方言与汉祖语差异越大，方言从汉祖语变异的时间越长，方言讲话者对同祖语言讲话者的认知就越差。族群名称宣示着“外来者”的身份，方言名称强调方言与汉祖语的关系，有利于对同祖语言族群的认知。客家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的认知会呈现出较强的祖根意识。本研究选取广东三大方言的大学生，通过考察对族群信息的记忆与注意探查对中原族群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揭示语言演变差异和族群/方言名称对族群信息加工的影响。本研究对扩展语

言与文化、认知关系的研究, 厘清语言变异、族群/方言名称与族群认知的关系,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根祖文化的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 实验 1: 语言演变差异对族群信息记忆的影响

采用群体参照的 R/K 范式考察语言演变差异是否影响族群信息记忆。由于在历史上河南是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所以, 选取河南人代表中原族群, 选取朝鲜族代表无关族群, 作为本族群的对照。如果语言演变差异和族群/方言名称影响群体参照效应, 方言族群与参照族群就会出现交互作用。具体说, 三个方言群体在不同族群参照下产生不一致的加工成绩, 客家人在河南人参照下的记忆成绩应该好于在朝鲜族参照下, 广府人和潮州人在河南人和朝鲜族参照下的记忆成绩应该无显著差异或者差异比客家人小。

2.1 被试

汉族本科生 90 名, 客家人、广府人、潮州人各 30 名, 所讲方言均限于本族群方言。年龄在 17~23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20.6 岁, 男女比例大体均衡, 普通话水平均在二级乙等以上, 皆为广东籍, 一直在广东学习并参加高考, 在生活环境、学习能力、教育水平等方面匹配,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皆为右利手。

2.2 设计

3 (方言族群: 客家话讲话者/粤语讲话者/潮汕话讲话者) × 3 (参照族群: 本方言族群/河南人/朝鲜族)混合设计。方言族群为被试间变量, 参照族群为被试内变量。

2.3 材料

从《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刘源 等, 1990)中选择中等频度人格形容词 180 个, 积极词和消极词各半。在学习阶段, 分层随机抽 120 个双极形容词(积极词和消极词各半)与 3 个族群搭配成 120 个词对, 得到"本族群−积极词、本族群−消极词、河南人−积极词、河南人−消极词、朝鲜族−积极词、朝鲜族−消极词"6 组各 20 个词对。在再认阶段, 从 6 组词对中均随机抽取 10 个词对予以保留, 由 60 个学过双极形容词(积极词与消极词各半)与 60 个未学过双极形容词(积极词与消极词各半)构成 120 再认词。匹配积极词与消极词的词频和笔画数, 30 名同质被试采用 7 点量表评定词语的效价(1 = 非常消极, 7 = 非常积极)。材料信息见表 1。

统计表明, 在学习阶段, 两组词语的平均笔画数差异不显著, $t(118) = 1.60$, $p = 0.112$; 平均词频差异不显著, $t(118) = 0.275$, $p = 0.784$。将积极词和消极词分别取调节后效价值(中值"4"减去原效价值后取绝对值)进行 t 检验, 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平均效价差异不显著, $t(118) = 1.34$, $p = 0.794$。在再认阶段, 两组词语的平均笔画数差异不显著, $t(118) = 0.16$, $p = 0.871$; 平均词频差异不显著, $t(118) = 0.86$, $p = 0.591$。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平均效价差异不显著, $t(118) = 1.46$, $p = 0.621$。

2.4 程序

(1)学习阶段: 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 300 ms, 然后呈现问题("你认为这个词适合描述本族群的人/河南人/朝鲜族人吗?"), 300 ms 后, 该问题与某个人格特质词同时呈现 3000 ms, 要求被试判断。半数被试按 F 键表示"是", 按 J 键表示"否", 半数被试的按键方式相反。共有 120 试次, 项目随机呈现。

(2)分心阶段: 为了防止被试复述, 在学习阶段结束后, 屏幕上出现指导语, 提示在空白纸上执行纸笔任务, 以大写方式按顺序每隔一个写下 26 个英文字母的 13 个字母, 时间 1 min。

(3)再认阶段: 主试讲解 R 和 K 的意义, 确定被试理解后进行 4 轮练习, 再正式实验。每一试次安排如下: 首先在屏幕中央出现"+"注视点 300 ms, 空屏 300 ms, 在屏幕中央出现人格特征形容词, 要求被试按键判断词是否在学习阶段出现过, 如果认

表 1　实验 1 人格形容词信息表

实验过程	人格词类型	材料举例	平均笔画数	平均字频	词性效价
学习阶段	积极词	正直 可靠	17.18 (4.54)	165.55 (67.79)	5.66 (1.43)
	消极词	势利 固执	18.60 (5.13)	159.36 (72.74)	2.43 (0.93)
再认阶段	积极词	踏实 稳重	17.53 (3.74)	163.49 (68.33)	5.58 (1.63)
	消极词	粗鲁 马虎	18.15 (5.47)	160.57 (72.81)	2.32 (0.96)

注: 词频选自北京语言学院编《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 年版, 单位为百万分之一。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下同)。

为词在学习阶段未出现，按 M 键，直接进入下一试次；如果认为词在学习阶段出现过，按 C 键，按键后在屏幕中央出现新的判断任务“请做记得/知道判断”，如果被试能回忆出某个特定项目，并且回忆起与该项目相关具体细节，即为“记得”，按 A 键；如果只觉得该项目熟悉却回忆不起相关细节，即为“知道”，按 K 键，被试完成判断后进入下一试次。共有 120 试次，项目随机呈现。实验持续约 15 min。流程见图 1。

2.5 结果与分析

被试的整体再认率高于 10%，数据均进入分析。再认成绩、R 成绩及 K 成绩见表 2。

2.5.1 再认成绩分析

再认校正成绩(击中百分比−虚报百分比)的方差分析表明，方言族群的主效应不显著，$F(2, 87) = 0.57$, $p = 0.567$。参照族群的主效应显著，$F(2, 174) = 23.71$, $p < 0.001$, $\eta_p^2 = 0.21$。均数比较表明，参照本族群的成绩(M = 0.76, 95% CI [0.72, 0.79])显著高于参照朝鲜族(M = 0.67, 95% CI [0.63, 0.71])和参照河南人(M = 0.67, 95% CI [0.64, 0.72]), $ps < 0.001$，其他参照条件之间的成绩差异不显著，$p > 0.05$；方言族群和参照族群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4, 174) = 1.44$, $p = 0.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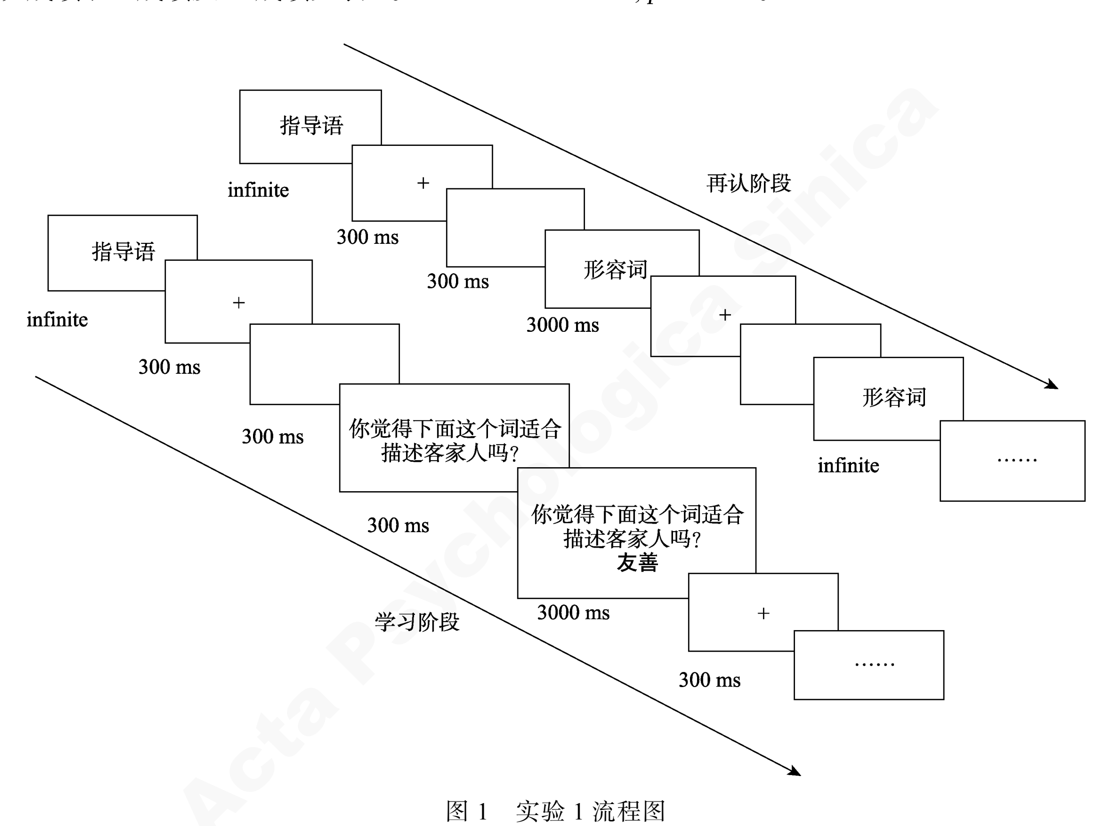


图 1 实验 1 流程图

表 2 不同方言群体在不同参照加工任务中的再认率及 R/K 判断率

被试类型	参照条件	记忆类型		
		再认	R	K
客家话讲话者	参照客家人(本族)	0.76 (0.15)	0.45 (0.25)	0.30 (0.23)
	参照河南人(中原)	0.68 (0.19)	0.40 (0.24)	0.33 (0.19)
	参照朝鲜族(无关)	0.66 (0.20)	0.35 (0.22)	0.28 (0.17)
粤语讲话者	参照广府人(本族)	0.76 (0.13)	0.46 (0.25)	0.29 (0.15)
	参照河南人(中原)	0.70 (0.14)	0.35 (0.22)	0.30 (0.21)
	参照朝鲜族(无关)	0.70 (0.15)	0.38 (0.24)	0.35 (0.20)
潮汕话讲话者	参照潮汕人(本族)	0.76 (0.19)	0.53 (0.24)	0.23 (0.15)
	参照河南人(中原)	0.64 (0.18)	0.38 (0.22)	0.26 (0.16)
	参照朝鲜族(无关)	0.63 (0.22)	0.37 (0.21)	0.24 (0.14)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下同。

2.5.2 “记得”成绩分析

“记得” (“R”)校正成绩(击中百分比−虚报百分比)的方差分析表明，方言族群的主效应不显著，$F(2, 87) = 0.13$, $p = 0.875$。参照族群的主效应显著，$F(2, 174) = 29.02$, $p < 0.001$, $\eta_p^2 = 0.25$。均数比较表明，参照本族群的成绩(M = 0.48, 95% CI [0.43, 0.53])显著高于参照朝鲜族(M = 0.37, 95% CI [0.32, 0.42])和参照河南人(M = 0.38, 95% CI [0.33, 0.43]), ps < 0.001，其他参照条件之间的成绩差异不显著，$p > 0.05$。方言族群和参照族群的交互作用显著，$F(4, 174) = 2.50$, $p = 0.045$, $\eta_p^2 =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客家话讲话者对不同参照族群的记忆成绩呈现出梯级效应，即参照本族群的成绩(M = 0.46, 95% CI [0.36, 0.55])显著高于参照河南人(M = 0.40, 95% CI [0.31, 0.49]), $p = 0.017$，参照河南人的成绩显著高于参照无关族群(M = 0.35, 95% CI [0.26, 0.44]), $p = 0.050$。另外两个方言族群参照本族群的成绩显著高于参照其他族群，ps < 0.05，参照河南人和参照朝鲜族的成绩差异不显著，$ps > 0.05$。

2.5.3 “知道”成绩分析

“知道” (“K”)校正成绩(击中百分比−虚报百分比)方差分析表明，各种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 > 0.05$。

2.6 小结

“记得”成绩是反映自我认知加工的稳固指标(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实验 1 表明：(1)三个方言族群在本族群参照下均表现出更好的记忆成绩，出现了本族群参照效应。(2)相对于粤语族群和潮汕话族群，客家方言族群对代表中原人的河南族群的信息有更好的记忆，出现了同祖语族群参照效应。

3 实验 2：语言演变差异对族群信息注意的影响

由于客家人始终“不忘祖宗言”，并且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中原士族，因此，相对于无关族群，会对中原族群的信息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形成更好的记忆。客家人对中原族群信息是否存在着注意偏向？注意偏向(Attentional Bias)是指个体对特定刺激的高敏感性并且伴随着选择性的注意。例如，与无情绪色彩刺激比，有情绪色彩刺激更能够吸引注意或者占用更多的注意资源(Sveen et al., 2009)。注意偏向有两种类型：(1)注意警觉，是指个体对未出现但可能出现的对个体具有重要适应意义的刺激保持的觉察和持续性的机能准备状态(覃义贵, 2012)。人类对负性刺激存在着注意警觉(Chen & Jackson, 2006; 冯文锋 等, 2010; 寇慧 等, 2015; Miltner et al., 2004)，对负性刺激优先关注。例如，消极情绪刺激诱发更大波幅的 N100(Bar-Haim et al., 2005; Doallo et al., 2007; Luo et al., 2010)和更大波幅的 N170(Montalan et al., 2008)。P200 更多地指向消极信息(郭军峰, 罗跃嘉, 2007; 罗跃嘉 等, 2006; 马建苓 等, 2012; 张积家 等, 2020)。(2)注意脱离困难。Cho 和 Lee (2013)发现，身体不满意程度高的男性更频繁、更长时间地注意有肌肉的身体图片，身体不满意程度高的女性更频繁、更长时间地注意瘦的身体图片。在语言认知中，如果某一词语或者概念被激活了，对与该词语或概念的注视也会多于对其他刺激(王丹 等, 2019; 闫国利 等, 2010)。实验 2 设置了不同族群名称作为启动刺激——本族群名称、河南人(中原族群)、朝鲜族(无关族群)，同时设置了无启动条件“****”，要求被试判别靶词的颜色。如果语言演变差异和族群/方言名称影响个体对族群信息的注意，方言族群与启动族群就会出现交互作用。具体说，三个方言群体在不同启动族群条件下产生不同的注意分配，相对于无关族群启动，客家人在河南人启动下产生注意偏向，干扰随后的加工，表现为对词语颜色的判断更慢，准确率更低；广府人和潮州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1 被试

汉族本科生 90 名，客家人、广府人、潮州人各 30 名，其方言只限于本族群方言，年龄在 17~2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2.2 岁，男女比例均衡，普通话水平均在二级乙等以上，皆为广东籍，一直在广东学习并参加高考，在生活环境、学习能力、教育水平等方面匹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皆为右利手。均未参加实验 1。

3.2 设计

3 (方言族群：客家话讲话者/粤语讲话者/潮汕话讲话者) × 4 (启动族群名称：本族群名称/河南人/朝鲜族/无启动) × 3 (人格特质词效价：消极/积极/无关)混合设计。方言族群为被试间变量，启动族群名称和人格特质词效价为被试内变量。

3.3 材料

由启动族群名称−靶词对构成。以族群类别词“本族群名称/河南人/朝鲜族/****”为启动刺激，“****”为无启动条件。靶词皆为形容词，包括 3 类：(1)积极人格特质词(88 个，每一启动条件有 22 个，

21 个用于正式实验, 1 个用于练习); (2)消极人格特质词(88 个, 每一启动条件有 22 个, 21 个用于正式实验, 1 个用于练习); (3)无关词, 与人格特质完全无关的描述环境和景物的词(88 个, 每一启动条件有 22 个, 21 个用于正式实验, 1 个用于练习)。共有 264 个词。词语选自《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刘源 等, 1990)。刺激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 靶词背景为白色, 字体为黑体。实验前, 将目标字混合呈现打印在纸上交给被试, 确保被试熟悉后开始实验。匹配 3 组汉字的词频和笔画数, 30 名同质被试用 7 点量表评定词语效价(1 = 非常消极, 7 = 非常积极), 材料信息见表 3。

表 3 实验 2 的靶词信息

靶词类型	材料举例	平均笔画数	平均字频	平均效价
积极词	善良 勤劳	23.50	187.70	6.01
消极词	狡诈 懒惰	24.14	168.11	1.87
无关词	明亮 危险	23.03	172.20	4.03

统计表明, 三组汉字的平均笔画数差异不显著, $F(2, 261) = 5.33$, $p = 0.78$; 平均字频差异不显著, $F(2, 261) = 6.20$, $p = 0.85$; 将积极词和消极词分别取调节后效价值(效价中值“4”减去原效价值后取绝对值)做 t 检验, 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平均效价差异不显著, $t(174) = 1.16$, $p = 0.51$。取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平均效价值与无关词做方差分析, $F(2, 261) = 2.10$, $p = 0.40$, 差异不显著。

3.4 程序

采用 E−Prime 系统编程, 用奔腾 4 型计算机呈现材料。流程见图 2：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 300 ms, 接着呈现一个黑色启动词(族群名称)或黑色“****”600 ms, 空屏 500 ms, 接着以红色、绿色或蓝色快速呈现靶词 400 ms, 空屏 3000 ms, 要求被试在 3000 ms 内通过按键判别词语的颜色并用左、右手食指和右手拇指尽量准确、尽快按键做出“红”、“绿”或“蓝”反应(实验前将“红”、“绿”、“蓝”提示标签分别贴在键盘的 Q、P 和空格键上)。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反应正误。实验包括 252 试次, 材料呈现顺序随机化。在正式实验前, 用非实验材料进行 12 次练习。

3.5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剔除错误反应和 $M \pm 2.5$ SD 之外的数据, 占 1.78%。结果见表 4。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在启动条件下, 方言族群的主效应显著, $F(2, 87) = 3.21$, $p = 0.049$, $\eta_p^2 = 0.07$。客家话讲话者的反应时($M = 815$ ms, 95% CI [748, 883])显著长于潮汕话讲话者($M = 701$ ms, 95% CI [634, 769]), $p = 0.020$, 边缘显著地长于粤语讲话者($M = 726$ ms, 95% CI [659, 794], $p = 0.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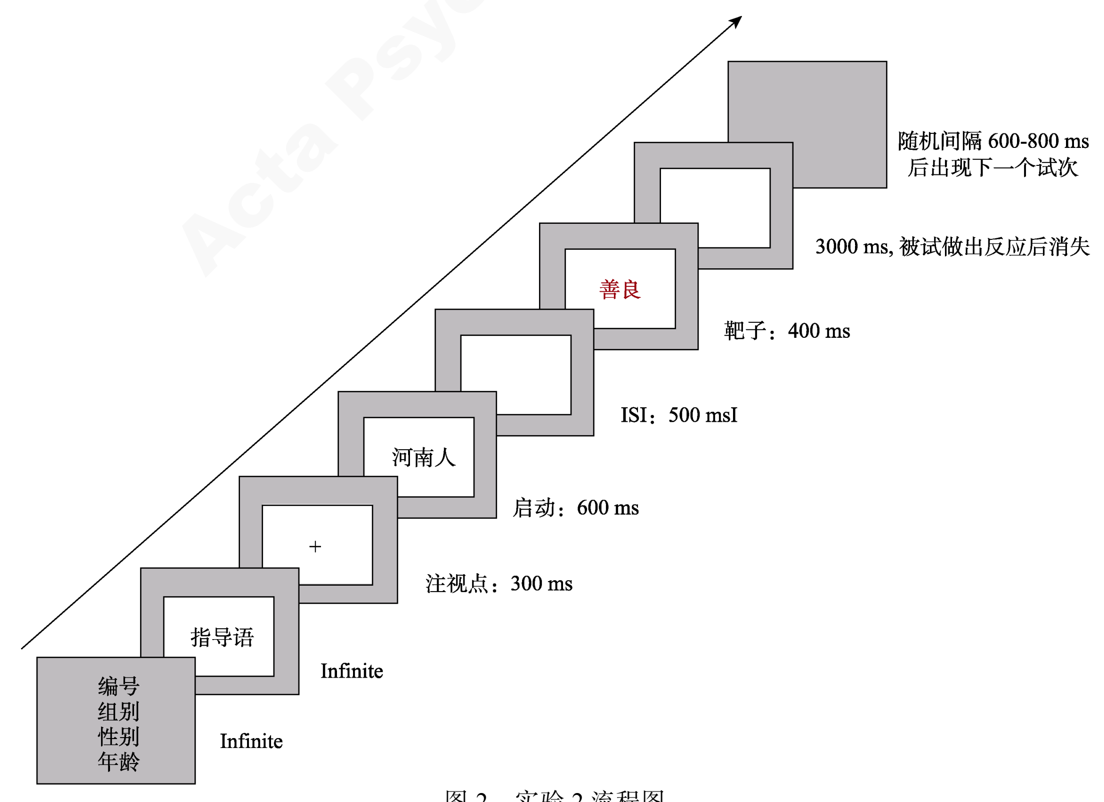


图 2 实验 2 流程图

表 4　不同族群名称启动的平均反应时(ms)和平均错误率(%)

被试类型	启动族群名称	靶词					
		积极词		消极词		无关词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客家话讲话者	客家人(本族)	1041(459)	2.13 (4.87)	1056 (448)	1.93 (4.06)	1036 (459)	1.83 (3.07)
	河南人(中原)	817 (257)	1.80 (3.46)	810 (227)	3.10 (4.65)	816 (228)	2.13 (3.52)
	朝鲜族(无关)	638 (148)	3.27 (4.95)	624 (137)	3.43 (6.52)	628 (141)	2.80 (4.39)
	无启动	621 (170)	2.43 (3.89)	621 (164)	2.30 (3.53)	640 (164)	2.80 (4.88)
粤语讲话者	广府人(本族)	925(354)	1.50 (2.33)	911(338)	2.33 (2.91)	931 (354)	2.00 (3.10)
	河南人(中原)	617(105)	2.83 (2.84)	628 (108)	2.83 (3.64)	634 (110)	2.60 (4.70)
	朝鲜族(无关)	634 (115)	1.67 (2.73)	623 (101)	1.80 (3.21)	635 (126)	2.83 (3.86)
	无启动	628 (100)	2.30 (3.77)	526 (103)	1.67 (2.73)	639 (125)	1.17 (2.52)
潮汕话讲话者	潮汕人(本族)	905 (243)	1.30 (3.33)	908 (225)	2.67 (3.40)	933 (242)	3.67 (2.73)
	河南人(中原)	583 (143)	2.70 (5.03)	585 (147)	2.03 (6.21)	591 (155)	3.23 (5.13)
	朝鲜族(无关)	587 (156)	3.33 (3.55)	578 (156)	2.43 (4.83)	588 (158)	2.53 (5.85)
	无启动	585 (172)	3.33 (4.22)	583 (148)	1.97 (4.31)	588 (155)	2.40 (5.40)

潮汕话讲话者和粤语讲话者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599$。启动族群名称的主效应显著, $F(2, 174) = 88.27$, $p < 0.001$, $\eta_p^2 = 0.50$。本族群名称启动的反应时(M = 959 ms, 95% CI [885, 1034])显著长于河南人启动(M = 672 ms, 95% CI [636, 708])和朝鲜族启动(M = 611 ms, 95% CI [584, 639]), 河南人启动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朝鲜族启动, $ps < 0.001$。方言族群与启动族群名称的交互作用显著, $F(4, 174) = 2.71$, $p = 0.032$, $\eta_p^2 = 0.06$。其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在无启动条件下, 各种主效应和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ps > 0.05$。

为了比较不同方言被试的表现, 分别进行不同方言族群在有启动时的反应时方差分析。

对客家话讲话者分析表明, 启动族群名称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26.69$, $p < 0.001$, $\eta_p^2 = 0.48$。本族群名称启动的反应时(M = 1023 ms, 95% CI [855, 1191])显著长于河南人启动(M = 804 ms, 95% CI [715, 893])和朝鲜族启动(M = 618 ms, 95% CI [570, 667]), 河南人启动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朝鲜族启动, $ps < 0.001$。其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对粤语讲话者分析表明, 启动族群名称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23.41$, $p < 0.001$, $\eta_p^2 = 0.45$。本族群名称启动的反应时(M = 922 ms, 95% CI [794, 1051])显著长于河南人启动(M = 626 ms, 95% CI [587, 665])和朝鲜族启动(M = 631 ms, 95% CI [590, 672]), $ps < 0.001$; 河南人启动和朝鲜族启动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467$。其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对潮汕话讲话者分析表明, 启动族群名称的主效应显著, $F(2, 58) = 53.54$, $p < 0.001$, $\eta_p^2 = 0.65$。本族群名称启动的反应时(M = 932 ms, 95% CI [842, 1021])显著长于河南人启动(M = 586 ms, 95% CI [532, 641])和朝鲜族启动(M = 585 ms, 95% CI [528, 643]), $ps < 0.001$。河南人启动和朝鲜族启动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888$。其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各种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3.6　小结

实验 2 发现, 在反应时上: (1)客家话讲话者的反应时显著长于潮汕话讲话者和粤语讲话者。究其原因, 是因为客家话讲话者在本族群名称和河南人启动下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另外两个族群。客家话讲话者在本族群名称启动下的反应时(M = 1044 ms)显著长于潮汕话讲话者(M = 915 ms)和粤语讲话者(M = 922 ms), 反应时差分别为 129 ms 和 122 ms, $ps < 0.001$; 客家话讲话者在河南人启动下的反应时(M = 814 ms)显著长于潮汕话讲话者(M = 586 ms)和粤语讲话者(M = 626 ms), 反应时差分别为 228 ms 和 188 ms, $ps < 0.001$; 客家话讲话者在朝鲜族启动下的反应时(M = 630 ms)与潮汕话讲话者(M = 584 ms)和粤语讲话者(M = 631 ms)却无显著差异, 反应时差仅为 46 ms 和−1 ms。(2)对客家话讲话者而言, 本族群名称启动 > 河南人启动 > 朝鲜人启动。(2)对潮汕话讲话者或粤语讲话者而言,

本族群名称启动 > 河南人启动 = 朝鲜族启动。这说明，三个族群的被试在本族群名称启动下均产生了注意偏向，在河南人启动下，客家话讲话者产生了注意偏向，潮汕话讲话者和粤语讲话者未出现注意偏向。

4 综合讨论

本研究表明，三个方言族群均表现出对本族群信息的记忆优势与注意偏向，客家话讲话者对以河南人为代表的中原族群表现出记忆优势与注意偏向，粤语讲话者和潮汕话讲话者却没有此类表现。

4.1 关于本族群的信息加工优势

自我包括三种表征：个体自我、集体自我和关系自我(Brewer & Gardner, 1996; Greenwald et al., 1998)。个体自我处于自我的核心，集体自我是个体自我的拓展与延伸。集体自我对记忆的影响可以通过群体参照效应来体现——当参照对象为所属群体时，对相关材料的记忆优于语义加工，甚至产生了与自我参照加工同等的优势(Johnson et al, 2002)。实验 1 发现，三个方言族群均出现了本族群体参照效应，当信息与所属族群联系时，记忆效果最好。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Greenwald et al., 1998; Johnson et al., 2002; Xia et al., 2020; 杨红升, 黄希庭, 2007)。本族群参照编码是加工内群体信息，即对“我们”进行加工，因此“记得”比例更高。

三个族群在即时加工中均表现出对本族群信息的注意偏向。在本族群名称启动后，将更多的认知资源分配到词语语义加工上，从而影响了词色判断。由于反应时的延缓不仅针对消极词还针对积极词，这种偏向就包括了注意的警觉、回避和脱离困难。注意警觉或回避大多指向有威胁或负性的刺激(Chen & Jackson, 2006; Gladwin & Vink, 2020)，对积极刺激一般是注意脱离困难(江沂芯, 陈红, 2019; 王丹 等, 2019; 闫国利 等, 2010)。不管是哪一种注意偏向，这种由本族群名称启动带来的认知资源分配模式可以归因于集体自我，即内群体是关注的焦点，相关信息得到了重视，获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加工深度更大，在实时双任务中表现为影响另一任务，在延时再认中，表现为提取更容易。因此，对本族群信息的注意偏向与记忆增强是一个连贯的认知加工过程。客家话讲话者对本族群信息的注意偏向更明显，显然与客家话讲话者的自我意识有关。身处广东，客家人的“外来者”身份更加明显，族群意识更加强烈，导致对本族群的信息更加注意。

4.2 关于客家话族群对中原族群的祖根情结

客家话族群对以“河南人”为代表的中原族群信息记忆更好，出现了同祖语族群参照效应，他们分配给“河南人”的注意资源更多，粤语族群和潮汕话族群却未出现这种效应。客家人一直认为他们的“根”在中原(樊洛平, 2016)，这种情结可以称之为“祖根情结”。这种祖根情结可以从迁徙历史、族群称谓和语言演变三方面来加以解析：

(1)客家话族群的迁徙史孕育了浓郁的祖根情结。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均是北方汉族人在不同时期迁移到广东的不同地区后形成的，客家人是最晚迁入广东的中原移民。

广府人最早迁徙至广东，其先民在先秦时入粤。北方移民与岭南原住民(史称“百越”，又称“百粤”)逐步融合后形成了广府人的雏形。北方汉族南移多以南雄珠矶巷为入粤的第一站，故广府民系以“南雄珠玑巷”为祖庭(《开平县志》卷二)。在明代，以讲粤语为特征的广府人形成了，“广府人”成为广州府一带汉族人的俗称(徐杰舜, 2012)。潮汕地区古属闽越，居民是闽越人(岑麒祥, 1953)。中原汉族人入潮始于秦汉，潮汕族群的主体是因为战乱或灾荒从中原入闽后辗转至潮汕的汉族人。汉族人入闽源于汉晋之际，大规模入闽在东晋至唐时期，并且在当地形成了闽南方言。在唐宋年间，中原汉族持续入闽，泉州与漳州地域狭小，闽南人开始向粤东的潮汕地区南迁(徐杰舜, 1999)，史称“福佬人”。在潮属族谱中，先世由闽入潮者众多(叶恩典, 1997)。移民的闽南话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方言糅合，逐渐形成了与漳泉闽南话有别的潮汕话。潮汕民系随着元明时期潮汕话的独立而形成。客家人是最晚入粤的中原移民。客家人南迁虽然可以追溯至晋义熙九年在大埔、梅县的“流人营”以及唐开元年间在宁化的“避役之民”，但大量南迁始于北宋。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学术界尚无定论，分别有宋代说(陈运栋, 1978; 罗香林, 1989)、宋元之交说(孔永松, 1992)、元末明初说(冯秀珍, 2003)、明代中叶说(任崇岳, 2019; 杨海中, 2008)、明末清初说(陈支平, 1997; 刘佐泉, 1996)。不管哪一种说法更贴近史实，相对于广府人与潮汕人而言，客家人都属于后来者。同为南迁的汉族人，粤语族群和潮汕话族群抢先占领了珠三角地区和韩江流域，经济、文化实力强，客家话族群只能够向粤东、粤北山区发展。客家先民入粤定居的梅县(现梅州)，当时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于潮州和惠州。先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

先到者称后到者为“客家”，后到者称先到者为“福佬”“广府”。由此，梅县的客家人率先把“客家”由他称变成了自称。在与其他民系的比较中，梅县的客家人较早地产生了自我完善意识，强化了语言、习俗、价值取向等共性，进入了客家的成熟期(严峻, 2004)。由此，作为最晚从中原迁徙至广东的群体，客家民系对故土的眷恋尤为深重，他们自称为“中原士族”“三代遗民”，自认为是古老汉族的“嫡系”，十分崇敬祖先，重视追本溯源的族谱(徐杰舜, 1999)。

(2)“客家”族群称谓对客家人的祖根情结起着提示作用。客家(人)、潮汕人、广府人虽然均属于南方的汉族分支，但相较于潮汕人和广府人，“客家(人)”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对“客家”称谓的来源，语言学家从“客”的意义上分析。王力(1963)认为，客家是相对于“主”而言的对称，即“外来人”。这一观点被引伸为“客而家焉”，即作客他方并以此为家，即为客家。“客”反映了族群迁移过程。刘镇发(2002)认为，客家是明末清初客家方言族群大迁徙的产物，迁居异地的客家方言族群被土著称为“客”。在明朝中后期，中国自北而南的人口迁移高潮已经结束，广府人、潮汕人定居下来，只有客家人还处在迁移中。“客家”一词在总体上反映了客家民系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历史际遇和“客吾所客”“以客自谓”的大度和豁达(王东, 1996)。

同属于南迁的汉族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在迁入地落地生根，逐渐认同了当地，并且以迁入地为族群称谓；客家人尽管在迁入地居住了多年乃至数十代，却始终不肯融合和同化，一直保持着“客”的身份。“客家”这一族群称谓时刻提醒着族群成员其祖根不在所居地。客家人认为，他们的先祖是中原士族。这种对中原文化认同的祖根意识在客家文化中随处可见。寻找古老的原乡是客家人心灵深处的召唤。正如《梅州黄氏源流歌》中所说：“轩辕黄帝本苗裔，十传南陆国封黄，国名为姓称始祖，河南光州是原乡。”客家人顽强地固守着中原文化，不认同迁入地文化，以“客”自称或者被称，以“客”之心态生存在一个个不断变迁的侨居地中。

从心理学上说，族群称谓是语言标签。语言标签具有分类功能，这种功能可以用容器隐喻来解释。容器隐喻是指用容器状的意象图式来表征抽象概念，用来表征事物的类别、个体与他人的亲密度。根据容器隐喻，容器内个体是“内”，容器外个体是“外”(张积家, 2018)。由此，族群称谓将人划分成内外群体，容器内成员互有好感，容器外成员相互之间有疏离感。中国的人际交往与传统文化存在着以己为中心、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1998；涂骏, 2009)，汉民俗也存在着宗教般的祖先崇拜(渡边欣雄, 1998)。因此，祖先或祖根在容器内具有相当的分量。当客家人自称或被呼为“客”时，是一种参照“他者(主)”对“自我(客)”的重新审视，他们在比较中获取了深层次的自我认知，促进了持守祖根的文化自觉。

(3)客家方言塑造了客家族群的祖根意识。语言在族群识别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客家方言才是界定客家的最基本要素”(陈支平, 1997)。黄淑娉(1999)在广东调查，当询问“你主要根据什么特征来确认自己和别人是广府人或潮汕人或客家人？”时，64.29%的广府人、62.73%的潮汕人和62.24%的客家人认为主要根据方言来确认。语言保持有助于族群认同提升。对海外华人研究显示，对汉语的保持有利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刘慧, 2016；邵江泳, 2015；吴建玲, 1996)，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质就是对祖籍国的亲情。另一方面，语言也不可避免地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特别是迁移族群的语言。徐祎(2018)发现，华语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华语发生了巨大变化，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及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在不断下降。

目前，相关探讨鲜有在汉族内部进行。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91.11% (2021数据)，分布在全国各地。虽然同为汉族，在发展中却出现了不同程度分化，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族群。广东是方言复杂的省份，粤语、潮汕话和客家话均从中原汉语中分化出来，但分化过程却各具特色。客家话的形成年代较粤语与潮汕话晚。粤语和潮汕话属于由于聚居某地域、交通不便、交往减少而逐渐形成的汉语共同语的“地方变体”；客家话是由于集团性人群迁徙形成的移民集团方言，长久而强固地保持祖先所操方言，不易为其他语言或方言同化(李新魁, 1994)。从分化历史看，算得上客家话源头的，只有祖先从中原带来的北方方言。客家先民带着中原汉语来到南方，由于新居地多在山区和沿海，与中原交往少，加之客家先民具有强烈的宗亲观念，重视固有传统，在迁移中始终保持群体的伙伴意识，具有很高的合作观念，重视亲族或血缘联系，虽然在分化过程中也受迁徙地语言影响，融入一些南方语言的语音与词，但始终未被其他语言

同化。正是由于这种亲族集体的强固关系和语言发展的相对保守性，使得客家先民从中原带来的北方方言，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汉语有别又与南方方言不同的一种新方言。黄遵宪在《< 梅水诗传 > 序》中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语言不少变。" "守语言不少变"意味着客家方言从迁移时就未脱离祖先的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保持着长期的紧密关系，形成后的客家话也比较接近北方方言。

简言之，客家方言在分化中较好地保存了祖先的语言，并且生动传达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儒家的伦理观念。客家人在习得和使用客家话时，也是其根源意识茁壮成长之时。

4.3 本研究结果的启示

(1)重视同根祖群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作用。习近平(2019)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应该加强中国 56 个民族的同根族群意识。56 个民族多元一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交往交流交融，终于形成了休戚与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同根族群意识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事业发展的保证。

(2)重视语言及其名称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与作用

语言是族群文化的核心，在族群认同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Parsons (1975)把语言和宗教视为族群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周大鸣(2001)指出："语言与族群紧密相联，……是文化各方面传递的主要机制，亦是族群认同的基础。"王锋(2010)认为，在族群认同中，语言起到了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殊作用。语言既是认同要素，又是认同载体，其他认同要素要通过语言才得以发挥作用。语言承载着族群演变的历史和文化。语言的去旧纳新印证着族群演变的历史轨迹，这种语言变化在迁徙族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族群在迁徙过程中难免在环境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下与其他的族群融合分化，由此在族群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同根族群，这种现象表现在语言上是形成了祖语。有关语言对族群认同作用的探讨较少关注同根族群。本研究从心理学角度以语言演变与族群/方言/称谓为出发点考察迁徙族群对同根族群信息加工的影响，发现操客家话的客家人对同根族群的信息产生了注意偏向与记忆优势，构筑了自身族群−祖根族群−其他族群的差序格局，体现了强烈的祖根情结和祖根意识。

因此，本研究表明，强烈的祖根情结和明确的祖根意识不仅与语言的来源与演变历史关系密切，还与族群/方言名称息息相关。客家人虽然为汉族民系，客家话虽然为汉语方言，却不以地域命名，而以"客家人" "客家话"来称说，凸显了客家人固守先祖的观念，强化了客家方言族群的内聚性。

客家族群及其方言的名称维系着对祖传语言的深厚感情，与对祖先宗族和祖国原乡的认同一脉相连。这种情感是根祖文化的内核，也是与同根族群构建共同体的重要资源。推而广之，民族共同体及其语言的共有名称，能够促进民族共同体凝聚情感的形成，助力民族共同体的构筑。"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各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民族在对待语言使用选择时，面临着把它在感情上看作是"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是"交流工具"的双重性，前者注重族群演变的历史，后者注重族群成员在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和未来发展机会(马戎, 2004)。如果语言名称能够凸显族群的根祖历史、强化其文化象征意义，言说者在使用该语言时，也就巩固了根祖意识与族群认同。实际上，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个体和共同体的双向建构(林尚立, 2013)。从共同体构建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在国家通用语言称谓上突出同根共祖的历史与共享文化象征，各民族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就可以更容易地体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也就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这一角度看，本研究发现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称说具有借鉴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国家通用语言"称为"普通话"。普通话虽然是国家通用语言的规范称谓，却不是最早的称谓(文贵良, 2009)。在我国历史上，国家通用语言的名称约有十种，使用较多的是"国语" "普通话" "标准语" "共同语"，得到国家正式认可的是"国语"和"普通话" (曹德和, 2011)。就"国语"和"普通话"哪一种说法更好，学者们有过热烈的讨论(如，丁安仪 等，2000；戴昭铭，1999；金丽莉，1997；杨应新，1989；张拱贵，王维周, 1987；周有光, 1985；祝世娜, 2003)。

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功能与

地位不断提高。在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口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各民族各地域对语言交流与服务的需求迅速上升，普通话与各民族语言和各地域方言、汉字与各民族文字如何和谐共存成为研究的热点。苏金智(2016)指出：普通话名称影响它同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的理解。如同是考察国家通用语言水平，面向大陆一语者时称为“普通话水平测试”，面向大陆二语者(以少数民族为主)时称为“汉语水平考试”，面向台湾二语者时称为“华语水平测试”。香港与澳门回归后，分别实施了“两文三语”(“两文”为中文和英文，三语为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与“三文四语”(“三文”为中文、葡萄牙文和英文，“四语”是粤语、普通话、葡萄牙语和英语)的语言政策。从名称上看，普通话的地位与粤语相似，并未显示出国家通用语言应有的涵摄力，不利于国家的语言认同。在国际上，由于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随着国力提升。语言互通是文明互鉴的基础，各国对学习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需求旺盛。然而，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称说上，国语、普通话、中文、汉语、华语等名称却一直纠缠不清。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称谓应该有新认知。从历史发展看，称普通话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称汉字为“中文”更加准确。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使用中华民族共同语和中文。由于族群语言称谓影响族群认同，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通用文字的称谓，“普通话”和“汉字”已经不能够很好地反映国家和民族的大一统，无法有效地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国家认同构建的应有作用。结合本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把国家通用语言称谓从“普通话”改为“中华民族共同语”或“国家通用语言”，将“汉字”改为“中文”，更加合适。这样，就能够从名称上凸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上下位关系，树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观念，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兼顾各少数民族与各地方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和谐健美的语言关系，凝心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结论

语言演变差异和族群/方言名称影响广东方言讲话者对中原族群的信息注意和保持，顽强保持祖先所操语言的客家方言族群对中原族群产生了群体参照效应，对中原族群产生了注意偏向。

参　考　文　献

Bar-Haim, Y., Lamy, D., & Glickman, S. (2005). Attentional bias in anxiety: A behavioral and ERP study. *Brain and Cognition, 59*(1), 11−22.

Bath, F. (2016).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Social organizations under cultural difference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费雷德里克·巴斯. (2016). *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rewer, M. B., & Gardner, W. (1996).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1*(1), 83−93.

Cao, D. H. (2011). Why is the proposal to restore the Chinese name not accepted? --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and character law.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10), 110−116.

[曹德和. (2011). 恢复“国语名称”的建议为何不被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中的探讨和思考. *社会科学论坛*, (10), 110−116.]

Cen, Q. X. (1953).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from Guangdong dialect. *Zhongguo Yuwen*, (4), 26−33.

[岑麒祥. (1953). 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 *中国语文*, (4), 26−33.]

Chen, H., & Jackson, T. (2006). Differential processing of self-referenced versus other-referenced body information among American and Chinese young adults with body image concerns. *Eating Behaviors*, *7*(2), 152−160.

Chen, Y. D. (1978). *Hakka people*. Taipei: Lianya press.

[陈运栋. (1978). *客家人*. 台北: 联亚出版社.]

Chen, Z. P. (1997). *The origin of Hakka*. Nanning: Gu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陈支平. (1997). *客家源流新探*.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Cho, A., & Lee, J.-H. (2013). Body dissatisfaction level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attentional biases toward idealized bodies. *Body Image, 10*(1), 95−102.

Conway, M., & Pleydell-Pearce, C. (2000).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the self-memory system. *Psychological Review*, *107*(2), 261−288.

Dai, Z. C. (1999). On the name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J. P. Lu (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p. 40).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戴昭铭. (1999). 关于民族共同语的名称问题. 见 吕冀平(编).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pp. 40).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Deng, X. H., & Wang, S. Y. (2003).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ical strata of old Min and Hakka dialects.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s*, (2), 10−14.

[邓晓华, 王士元. (2003). 古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 *古汉语研究*, (2), 10−14.]

Ding, A. Y., Guo, Y. J., & Zhao, Y. L. (2000). A bilingual interpretation of some popular definitions of "Chinese", "Putonghua" and "Kuo-yu".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7*(03), 100−106.

[丁安仪, 郭英剑, 赵云龙. (2000). 应该怎样称呼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从英汉对比看“汉语”、“普通话”、“国语”与“华语”等概念的使用.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7*(3), 100−106.]

Doallo, S., Cadaveira, F., & Holguín, S. R. (2007). Time course of attentional modulations on automatic emotional processing. *Neuroscience Letters, 418*(1), 111−116.

Fan, L. P. (2016). Tracing from the memory of the Hakka ethnic group in Taiwan to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Heluo——Taking the Hakka Literature in Taiwan as the object of observation. *Northern Forum*, (1), 55−60.
[樊洛平. (2016). 从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以台湾客家文学为观照对象. *北方论丛*, (1), 55−60.]
Fei, X. T. (1998). *The birth system of local China*. Beijing: Beking University Press.
[费孝通. (1998).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Feng, W. F., Luo, W. B., Liao, Y., Chen, H., & Luo, Y. J. (2010). Attention biases of undergraduate women with fat negative physical self: Orienting or maintena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2*(7), 779−790.
[冯文锋, 罗文波, 廖渝, 陈红, 罗跃嘉. (2010).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胖信息的注意偏好: 注意警觉还是注意维持. *心理学报*, *42*(7), 779−790.]
Feng, X. Z. (2003). *Hakka culture (Volume II)*. Beijing: Economic Daily Press.
[冯秀珍. (2003). *客家文化大观(中册)*.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Gan, Y. E, & Jian, Q. M. (2010).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cademic Research*, (9), 140−150.
[甘于恩, 简倩敏. (2010). 广东方言的分布. *学术研究*, (9), 140−150.]
Ge, Z. G. (2012). Looking fo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main axis and signpost: Reading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French culture. *DuShu*, (5), 74−85.
[葛兆光. (2012). 寻找主轴与路标的文化史——读《法国文化史》笔记. *读书*, (5), 74−85.]
Gladwin, T. E., & Vink, M. (2020). Spatial anticipatory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 Reliab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 RT-based online measurement.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81*, 102930.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 Schwartz, J. L. (1998).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4*(6), 1464−1480.
Guo, J. F., & Luo, Y. J. (2007). Negativity bias of social emotion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study.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5*(6), 574−576.
[郭军峰, 罗跃嘉. (2007). 社会情绪负性偏向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5*(6), 574−576.]
Huang, S. P. (1999). *Guangdong ethnic group and regional culture*. Guangzhou, China: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黄淑娉. (1999).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Huang, Z. X. (2000). *The world full of poetry*.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黄遵宪. (2000). *人境庐诗草*.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Jiang, Y. X., & Chen, H. (2019). Attention and recognition bias towards body-related cues among self-objectified femal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2*(6), 1462−1469.
[江沂芯, 陈红. (2019). 自我客体化的女性对身体线索的注意和记忆偏向. *心理科学*, *42*(6), 1462−1469.]
Jiang, Y. Z., Zhang, H. Z., & Zhang, P. Y. (2012).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fellow-townsman reference effect in China.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8), 1237−1242.
[姜永志, 张海钟, 张鹏英. (2012). 中国老乡心理效应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8), 1237−1242.]
Jin, L. L. (1997). Official language·Mandarin·Putonghua. *Yao Wen Jue Zi*, (4), 8−9.
[金丽莉. (1997). 官话·国语·普通话. *咬文嚼字*, (4), 8−9.]
Johnson, C., Gadon, O., Carlson, D., Southwick, S., Faith, M., & Chalfin, J. (2002). Self-reference and group membership: Evidence for a group-reference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2*(2), 261−274.
Kong, Y. S. (1992).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family system after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7−11.
[孔永松. (1992). 略论明中叶后客家人的家族制的发展.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7−11.]
Kou, H., Su., Y. H., Luo, X. C., & Chen, H. (2015). Attentional bias toward face-related words among females with facial negative physical self: Evidence from an eye-movement stud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7*(10), 1213−1222.
[寇慧, 苏艳华, 罗小春, 陈红. (2015). 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女性对相貌词的注意偏向: 眼动的证据. *心理学报*, *47*(10), 1213−1222.]
Li, J. Z. (2000). The composition of Baiyue in Cantonese. *Academic Forum*, (4), 92−98.
[李敬忠. (2000). 粤语中的百越语成分问题. *学术论坛*, (4), 2−98.]
Li, X. K. (1994). *Guangdong dialect*.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李新魁. (1994). *广东的方言*.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Li, X. K. (1987a).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Fujian Dialect in Guangdong.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3), 123−128.
[李新魁. (1987a). 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广东社会科学*, (3), 123−128.]
Li, X. K. (1987b).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Fujian diale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Continued).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4), 142−150.
[李新魁. (1987b). 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续). *广东社会科学*, (4), 142−150.]
Li, Y. M. (2018). Linguistics is a discipline group.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1), 15−24.
[李宇明. (2018). 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 *语言战略研究*, (1), 15−24.]
Lin, S. L. (201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8), 22−46.
[林尚立. (2013).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 (8), 22−46.]
Liu, H. X. (2013). Ethnic socialization: The social mechanism of ethnic identity generation.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3), 31−36.
[刘红旭. (2013). 族群社会化: 族群身份生成的社会机制. *黑龙江民族丛刊*, (3), 31−36.]
Liu, H. Y., & Li, Y. (2001). On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ver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languages——A case study of switches in Daur language.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1*(2), 79–83.
[刘宏宇, 李琰. (2001). 从达斡尔族的语言转用看城市化进程对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的影响.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1*(2), 79–83.]
Liu, H. (2016).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ic identity of Chinese ethnic communities in Indonesia: A Study in Batam, Pontianak, and Pekanbaru.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1), 42−49.
[刘慧. (2016). 印尼华族集聚区语言景观与族群认同——以峇淡, 坤甸, 北干巴鲁三地为例. *语言战略研究*, (1), 42−49.]
Liu, Y. (1990). *Frequency dictionary of common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 phonetic order. Beijing: Aerospace Press.

[刘源. (1990). *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音序部分*. 北京: 宇航出版社.]

Liu, Z. Q. (1996). The history of Hakka in "The history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Journal of Zhanjiang Teachers College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4), 89−93.

[刘佐泉. (1996). 《岭南逸史》中的客家史迹.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89−93.]

Liu, Z. F. (2002). The history of Hakka and the definition of Hakka Dialect. In *A study of Hakka dialect: Proceedings of the 4th symposium on Hakka dialect* (pp. 23–35).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刘镇发. (2002). 客家的历史与客家话的定义. 见 *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pp. 23–35).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Luo, W. B., Feng, W. F., He, W. Q., Wang, N. Y., & Luo, Y. J. (2010). Three stages of facial expression processing: ERP study with 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NeuroImage, 49*(2), 1857−1867.

Luo, X. L. (1989). *The origin of Hakka*. Beijing: China Overseas Chinese Publishing Company.

[罗香林. (1989). *客家源流考*.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Luo, Y. J., Huang, Y. X., Li, X. Y., & Li, X. B. (2006). Effects of emotion on cognitive processing: Series of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stud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4), 505−510.

[罗跃嘉, 黄宇霞, 李新影, 李雪冰. (2006). 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影响: 事件相关脑电位系列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14*(4), 505−510.]

Ma, J. L., Chen, X., & Wang, J. (2012).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own-race bia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3), 376−383.

[马建苓, 陈旭, 王婧. (2012). 本族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0*(3), 376−383.]

Ma, R. (2004).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Northwest Ethno-National Studies*, (1), 20−44+147.

[马戎. (2004).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民族社会学连载之三). *西北民族研究*, (1), 20−44+147.]

Miltner, W. H. R., Krieschel, S., Hecht, H., Trippe, R., & Weiss, T. (2004). Eye movements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threatening and nonthreatening stimuli during visual search in phobic and nonphobic subjects. *Emotion, 4*(4), 323−339.

Montalan, B., Caharel, S., Personnaz, B., Le Dantec, C., Germain, R., Bernard, C., … Rebaï, M. (2008). Sensitivity of N170 and late positive components to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emotional valence. *Brain Research, 1233*, 120−128.

Parsons, T. (1975).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trends of change of ethnicity. In N. Glazer, & D. P. Moynihan (Eds.), *Ethn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Qin, Y. G. (2012). *Vigilance and atten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stimulus detection*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覃义贵. (2012). *视觉刺激探测的警觉性注意特征* (博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Ren, C. Y. (2019-09-10). The Hakka people's department was formed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Chin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任崇岳. (2019-09-10). 客家民系形成于明代中叶. *中国社会科学报*.]

Shao, J. Y. (2015).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Taking Chinese in America as exampl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China.

[邵江泳. (2015). *族群语言与族群认同的关系研究——以在美华人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燕山大学, 秦皇岛.]

Shearer, W., & Sun, H. (2017). *An encyclopedia of the 140 languages of China: Speakers, dialects, linguistic elements, script and distributi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Su, J. Z. (2016). Putonghua and its functions, roles and transmission in the new era.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8*(5), 21−27.

[苏金智. (2016). 新时期普通话的功能地位及其传播.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8*(5), 21−27.]

Sun, H. K. (2017). The changes of Anong languag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From endangered to severely endangered.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2*(4), 17−24.

[孙宏开. (2017). 阿侬语的二十年变迁——由濒危走向严重濒危. *语言战略研究*, *2*(4), 17−24.]

Sveen, J., Dyster-Aas, J., & Willebrand, M. (2009). Attentional bias and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ne year after burn injury. *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 *197*(11), 850−855.

Tu, J. (2009). An interpretation of "Chaxu Geju".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6), 165−170.

[涂骏. (2009). 论差序格局. *广东社会科学*, (6), 165−170.]

von Humboldt, W. (1997/1936). *On the difference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piri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published 1836).

[洪堡特. (1999).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北京：商务印书馆.]

Wan, M. G., & Wang, Z. (2007). Ethnic identity, the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ethnic identity. *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 (3), 1−9.

[万明钢, 王舟. (2007). 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定与研究方法. *世界民族*, (3), 1−9.]

Wang, D. (1996). *Introduction to Hakka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王东. (1996). *客家学导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Wang, D., Wang, T., Qin, S., & Zhang, J. J. (2018). Location effect of Chinese wordable components in the component priming paradigm.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1*(2), 163−176.

[王丹, 王婷, 秦松, 张积家. (2019). 部件启动范式下可成字部件的位置效应. *心理学报*, 51 (2): 163−176.]

Wang, F. (2010). The role and expressive forms of language in the ethnic identity.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72−78.

[王锋. (2010). 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72−78.]

Wang, Q. G. (2002). 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surname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03-26(C03).

[王泉根. (2012). 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 *人民政协报*, 03−26(C03).]

Wang, L. (1963). *Chinese Phonolog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王力. (1963). *汉语音韵*. 北京: 中华书局.]

Watanabe, X. X. (1998). *Folk religion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 study of social anthropology*.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渡边欣雄. (1998). *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Wen, G. L. (2009). Yan Fu as the center: The practical rationality of Chinese and the modernity of "Mandarin".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1*(4), 96−103.

[文贵良. (2009). 以严复为中心: 汉语的实用理性与“国语”的现代性发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4), 96−103.]

Wu, J. L. (1996). A survey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100 Chinese American student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4), 122−132.

[吴建玲. (1996). 对一百名华裔学生语言文化情况的调查报告. *语言教学与研究,* (4), 122−132.]

Xi, J. P. (2019-09-28). Speech at the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Guangming Daily*.

[习近平. (2019-09-28).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光明日报*.]

Xia, R. X., Su, W. R., Wang, F. R., Li, S. F., Zhou, A. B., & Lyu, D. (2020).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self-enhancement on the group-reference effec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1463.

Xu, J. S. (1999). The Fulao people of south Fujian: Their formation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3), 75−81.

[徐杰舜. (1999). 闽南福佬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五.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75−81.]

Xu, J. S. (2002). Ethnic group and nationality: The concep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Ethno-National Studies*, (1), 14−20.

[徐杰舜. (2002). 论族群与民族. *民族研究*, (1), 14−20.]

Xu, J. S. (2012). Ethnic migr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Guangfu people.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 36−40.

[徐杰舜. (2012). 广府人的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36−40.]

Xu, Y. (2018). The diachronic covariation of Malaysian Mandarin and Malaysian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Studies on Cultural Soft Power,* (1), 62−70.

[徐祎. (2018). 马来西亚华语与华人族群认同的历时共变. *文化软实力研究*, (1), 62−70.]

Yan, G. L., Wu, J. G., Hu, Y. W., & Bai, X. J. (2010). Review of eye movement research paradigms in read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2), 1966−1976.

[闫国利, 巫金根, 胡晏雯, 白学军. (2010). 当前阅读的眼动研究范式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8*(12), 1966−1976.]

Yan, J. (2004). Looking for homeland: Three times of south migration of Hakka ancestors and formation of Hakka. *Lingnan Culture and History*, (S1), 13−15.

[严峻. (2004). 寻找家园——客家先民的三次南迁和客家民系的形成. *岭南文史,* (S1), 13−15.]

Yang, H. S., & Huang, X. T. (2007). Group-reference effect on memor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9*(2), 235−241.

[杨红升, 黄希庭. (2007). 中国人的群体参照记忆效应. *心理学报, 39*(2), 235−241.]

Yang, H. Z. (2008).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Heluo culture*. Zhengzhou, China: 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杨海中. (2008). *图说河洛文化*.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Yang, Y. X. (1989). On “Putonghua”.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3), 7.

[杨应新. (1989). 关于“普通话”的问题. *民族语文*, (3), 7.]

Yao, X. P. (1955). *Humboldt: Humanistic studies and languag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姚小平. (1995).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Ye, E. D. (1997). The relationship of Quanzhou and Chaozhou: Taking data of Quanzhou folk genealogy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Chaozhou Culture*, (6), 343−357.

[叶恩典. (1997). 略谈泉潮之关系——以泉州民间族谱资料为例. *潮学研究*, (6), 343−357.]

Ye, G. Q., & Luo, K. N. (1995). On the origin of Cantones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156−160.

[叶国泉, 罗康宁. (1995). 粤语源流考. *语言研究*, (1), 156−160.]

Zhang, G. G., & Wang, W. W. (1987). “Putonghua” or “Mandarin”?.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 42−48.

[张拱贵, 王维周. (1987). “普通话”, 还是“国语”?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3), 42−48.]

Zhang, J. J. (2018). Container metaphor, pattern of differential order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214−221.

[张积家. (2018). 容器隐喻、差序格局与民族心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 214−221.]

Zhang, J. J. (2019). *Nationality psycholog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张积家. (2019). *民族心理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Zhang, J. J., Lu, Y. T., Zhang, Q. R., & Zhang, J. Q. (2020). Th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nervousness and cognitive load on foreign language ly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2*(7), 861−873.

[张积家, 陆禹同, 张启睿, 张金桥. (2020). 外语焦虑、紧张情绪与认知负荷对外语说谎的影响——来自中−英双语者的证据. *心理学报*, *52*(7), 861−873.]

Zhang, P. Y., & Zhang, H. Z. (2013).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fellow-townsman reference effe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reference. *Culture Journal*, (1), 8−17.

[张鹏英, 张海钟. (2013). 群体参照视野下的老乡心理效应实验研究. *文化学刊*, (1), 8−17.]

Zheng, Q. C. (2016). The inheritance of Hakka dialect in Meixian County to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 *Wen Jiao Zi Liao*, (25), 26−27.

[郑秋晨. (2016). 梅县客家话对古汉语语音的传承. *文教资料*, (25), 26−27.]

Zhou, D. M. (2001). On the racial groups and relationship among racial groups.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3*(2), 13−25.

[周大鸣. (2001).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3*(2), 13−25.]

Zhou, D. M. (2002). *Ethnic group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Nanning, China: Guangx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周大鸣. (2002). *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Zhou, W. S., & Xu, N. S. (1998). *Heluo culture*. Beijing: Wuzhou Communication Press.

[周文顺, 徐宁生. (1998). *河洛文化*.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Zhou, Y. G. (1985). The new stage of character reform. *Language Planning*, (5), 3−9.

[周有光. (1985). 文字改革的新阶段. *文字改革*, (5), 3−9.]

Zhu, S., Long, Q., Li, X., Yang, J., Li, H., & Yuan, J. (2018). Self-relevant processing of stranger's name in Chinese society: Surname matters. *Neuroscience Letters, 126*, 126−132.

Zhu, S. N.. (2003). Several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popularizing Putonghua: On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Journal of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6), 89−91.

[祝世娜. (2003). 推广普通话的几个理论问题——从汉民族共同语说起.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89−91.]

Language evolution and ethnic group/dialect name affecting ethn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ree major Chinese dialects in Guangdong

WU Limei[1], ZHANG Jijia[2,1], MENG Le[3], ZHANG Xiaolin[1], HUANG Nanxin[1], ZHANG Jinqiao[1]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10,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3]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major dialects in Guangdong: Cantonese, Chaoshan, and Hakka. These dialects mainly formed dur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Han peop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language source, evolution history, and n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itself, the Hakka dialect is the smallest variation of Mandarin, Cantonese medium, and Chaoshan the largest. In terms of language-variation completion time, the Hakka dialect occurred most recently, followed by Cantonese, with Chaoshan occurring the earliest. Regarding the dialect names, a morpheme of "Ke" exists in the name Hakka, which always reminds its speakers that their ancestors ar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while Cantonese and Chaoshan are named after each locality.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has been whether thes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dialects affect the speaker'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the Central Plains group.

Guangdong college students who speak only one dialect of Hakka, Cantonese, and Chaoshan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ir language background in the present study. One hundred and eighty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two experiments, 90 per experiment. In experiment 1, the group reference R/K paradig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peakers of different dialects had a different memory effect on the Central Plains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on an unrelated group. Experiment 2 adopted the "starting stroop paradigm"; that is, using different group names as the starting stimulus, and personality adjectives with different valences as target stimuli,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judge the color of the target stimuli.

Experiment 1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a superior memory of their own group, but only Hakka dialect speakers experienced a group reference effect on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the Central Plains group, which resulted in a better memory effect on the Central Plains group than that on the unrelated group.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the longest reaction time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ir own ethnic group name was activated, but only the Hakka participants responded more slowly to the Henan ethnic group than to the unrelated ethnic group. The results of both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all the three dialect groups had processing advantages regarding the information of their own groups that manifested in the obvious referential effect of their own groups and the attention bias of their own information. Moreover, the Hakka participants' cognition regarding the Central Plains group represented by "Henan peopl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antonese and Chaoshan dialect speak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anguage evolution affected ethn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identity of ethnic groups with the same ancestry could be enhanced by kee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estral language completely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 and ancestral language. 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language evolution, ethnic group name, dialect